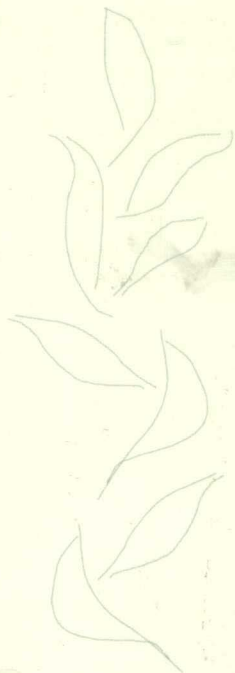


后双层经营体制

——中国农村经营制度设计

姚鸿健 著



“后双层经营体制”是一种“三个一”的架构：一条路子——拉开产业链，实行农工商一体化、产业化经营；一个载体——发展专业合作社，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产销制度；一个基本体制——坚持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尤其不能动摇家庭经营这个基础。一条路子是方向，一个载体是手段，一个体制是基础。

山东大学出版社

后双层经营体制

——中国农村经营制度设计

姚鸿健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双层经营体制——中国农村经营制度设计/姚鸿健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607-4083-6

I. ①后…

II. ①姚…

III. ①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32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108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23.5 印张 240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双层经营体制——中国农村经营制度设计/姚鸿健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607-4083-6

I. ①后…

II. ①姚…

III. ①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32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108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23.5 印张 240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行动大于启蒙

(序言)

贺立华 杨守森

鸿健兄的《后双层经营体制》，可以说是他前不久出版的《莱阳试验》的姊妹篇。鸿健兄以其惯有的激情与赤诚，执著与勤奋，以及一直恪守的“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情怀，在深刻洞察农村现状的基础上，对 21 世纪的中国农村经营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更为切实的见解与主张。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山东大学毕业生，鸿健的身影，一直牵引着诸位同窗的目光。他是自愿放弃高校生活沉入基层的，他在工厂干过车间主任和厂长，他出任过乡镇党委书记、县市体改委主任、财贸办主任、供销社主任、市长助理……不管级别高低、官位大小，他总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每到一地总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推进改革：“推行工厂方针目标管理”、“莱阳房改办小官与省级大领导对话”、“砸车与蒜薹事件化解”、“集贸城建立与搞活大流通”、“汪洋大海市场与莱阳合作社大船”……这一连串的符号都令人想起鸿健一连串改革的故事，用国家级教

学名师、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于良春兄的话说：“姚鸿健是我们 77 级这一代同学的代表，是胶东半岛改革新星李向南！”

提到姚鸿健，山大人往往都要提及“77 级”。77 级，包括 78、79 级，被世人称为“新三届”，这可谓是不尽的一代人。这一代见证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一代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特殊的一代，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这一代是贫穷的，但又是富有的：他们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时代，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虔诚的一代，是蒙昧的一代；这是觉悟的一代，是反思的一代；这是背负沉重传统的一代，是绝地奋起改革创新的一代；这是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一代，是脚踏实地苦干的一代；这是清醒有为的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姚鸿健正是这样一代人的代表。

效法“五四”《新青年》于 20 世纪 80 年代酝酿成立于省城学府里的《青年思想家》属于这一代人的学术杂志，这个杂志与鸿健兄的思想行动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群同代人集理想、道义、激情、热血在一起激荡的岁月。如果说《青年思想家》是承载这代人理想的一条船，那么鸿健就是鼓风的帆，我们同舟共济走过了二十年。也正是在鸿健兄的倡扬之下，《青年思想家》亮起了“行动大于启蒙”的旗帜，在齐鲁大地上团结起了一个“行动学派”，这个学派不仅注重著书立说“说”出一种文化，而更注重实践、注重用切实的行动“做”出一种文化。鸿健兄的学说是这一派学人的代表，他的学说，不是抄书，不是拼凑经典的粘贴，不是虚张声势的无病呻吟，而是酸甜苦辣生活浸泡出来的心血结晶，是具有现代实践品格的理论升华；他的学说，带着乡村大地鲜

活的泥土气,带着改革前线的硝烟味儿,又秉承着老一代哲人晏阳初、梁漱溟“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遗风;他的学说,为《青年思想家》书斋的研究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源头活水。有朋友说“《青年思想家》的血总是热的”,那么我们说,这热力正是来自她插入基层的滚烫的血管,来自“行动学派”的一批学人和改革家,他们正是被同学们誉为“胶东才子”的姚鸿健、在全国刮起“天达旋风”的张世家、三联集团张继升、山东省国资集团李江宁、纵横齐鲁为改革呼风唤雨的学者张景芬、徐向艺、何中华、刘小龙、庄平诸公。是他们的热血,给了《青年思想家》生命的颜色。

遥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大地吹起又一股改革的劲风,涌动起新一轮改革的春潮。此时,鸿健兄奉命出任莱阳供销合作社主任。与一些经历过 80 年代末激情受挫精神萎靡的知识分子不同,鸿健兄激情依然,依然是大学毕业时“改变中国首先要改变农村”的理想,依然是梁漱溟、晏阳初先生的思想情怀,依然是用深化改革去革除旧弊创建新制的行动;与许多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对待现实的态度不同,鸿健兄没有停留在拷问、愤怒和痛快一时的讨伐批判上,而更多、更强烈的是改造与建设的欲望,是修复与完善现存制度的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更愿意“修炉补灶”而不主张“毁炉挑灶”,他总是力图“修补”、“改造”出一个新世界来,他认为“这样成本最小”。由于社会转型,20 世纪 90 年代的供销合作社已近乎名存实亡,已失去了服务农民的应有职能,自身经营早就难以为继了,有人认为这样的部门彻底砸烂也不足惜,“供销合作社主任”之职是难有什么作为的闲官。但鸿健不这样认为,他多次给我们讲:合作社原本是个好东西,它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农民兄弟们你

五分我一毛合力创办起来的负责为农民供和销的服务机构,有很强的平民性。别看莱阳供销合作社现在亏损四千万,但这里有四千名员工,有广阔的农村市场,供销社只要把屁股调向农民一边,就完全有能力扭亏为盈。鸿健将莱阳供销合作社不景气的现状与莱阳一盘散沙似的农民个体经营联系在一起考虑问题,寻找改革突破口;鸿健潜心研究了世界各国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大胆提出了以供销社为枢纽,创建新型农村合作社的改革思路。在莱阳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鸿健兄主持的改革获得了成功,不仅使莱阳供销合作社扭亏为盈,而且使在市场经济大海里游泳的万千个体农户都被组织到各类合作社的大船之上,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举得到了中央及各级政府的重视,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取经者蜂拥而至。莱阳,一度成为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亮点。其间,鸿健的实际行动吸引了《青年思想家》不同专业的学者前往莱阳考察调研,他们欣喜地把莱阳的实践看作是自己这一代人在行动。他们是现任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当时的《青年思想家》负责人山大学者张华,经济管理学家徐向艺、刘小龙、李齐云、孙曰瑶,历史学家王学典、顾训中,政治体制研究专家刘京希、韩强,哲学社会学家张景芬、庄平,山大的美学博士生李庆本(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马耳他文化项目首席官员)、文化史学博士生张云龙(现为山东艺术学院院长),齐鲁电视台台长闫爱华及其率领的一大批青年记者等。他们风餐露宿,走遍了莱阳大地;他们为莱阳的改革摇旗呐喊,呼风唤雨;他们的思想认识也在这里得以跃迁。庄平教授说:鸿健能干实事干大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刘小龙教授这样评价鸿健及其莱阳人的合作社改革

实践：莱阳开创了农村改革的新时代。如果说，山西昔阳代表着人民公社时代；安徽凤阳代表着联产承包“大包干”时代；那么山东莱阳则代表着农业产业化经营时代。从凤阳到莱阳，中国农村改革迈出了现代化的重要的一步。

鸿健兄写于1998年、出版于2007年的《莱阳试验》一书，就是当年合作社改革探索的鲜活实录。此后，“莱阳试验”虽也引起过争议，但全国各地的实践证明，这一探索，为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的农民，寻得了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抵御个体经营风险的新路。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颁布实施，在这部法律中，无疑凝铸着鸿健兄以及投入合作社实践的莱阳人民的才华与智慧。

42岁那年，鸿健兄离开“梨乡”莱阳来到了“天尽头”的威海，到市委党校供职，他又一次进入书斋，但他的心仍然留在莱阳大地，留在梨花香味的泥土里，留在沉重的“三农问题”里。在这里，作为学者的鸿健有机会沉淀整理自己在泥土里摸爬滚打时的思想，形成条清缕晰的文字著述；在这里，作为教育长、科研处长的鸿健开创了“生成式”教育，有机会为来自泥土基层里的青年才俊授业解惑，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自己的思考见解；在这里，作为经济学教授的鸿健收获了一大批真诚为泥土服务具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的“黄埔弟子”，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活跃在威海政坛上的有生力量。

此后，鸿健兄进入威海市委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工作。高居布达拉宫式的“一号”大院办公楼，他的工作是为领导的文字服务还有千杯万盏的应酬，但他难以释怀的土地之恋，使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在安静的高楼

之上,鸿健深夜的忧思在民间之远,在沸腾的农村改革前线。实际上《莱阳试验》和《后双层经营体制》这两部著作,都是在这些夜晚反复修改、几经打磨、定型成书的。看到鸿健兄不断有新著问世,不少在高校做学问的老同学很感慨:“鸿健乃真才子也!”我们说,光一个才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和农民兄弟血肉相连、一起跳动的心,有一双如同农民兄弟般勤奋劳作的手。

与《莱阳试验》相比,鸿健兄的这部新作《后双层经营体制》,主要分析探讨的虽仍是通过发展新型合作社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但理论视野更为广阔,思考也更为深入。鸿健兄依据自己多年来的考察研究指出,与十年前相比,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形势,虽有了多方面的变化,但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并未改变,这就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变革与设计,必须紧紧围绕破解这两大基本矛盾来展开。鸿健兄的主张是:要建立“三个一”的农村经营新体制,即走一条路子,实行农工商一体化、产业化经营,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根本上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建立一个载体,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起以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产销制度,从而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坚持一个基本体制,就是要始终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其中最关键的是不能动摇家庭经营这个基础。鸿健兄所说的“后双层经营体制”,指的即是这样一种以“三个一”为架构的农村经营制度。

在鸿健兄的论述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由于农业生产无法标准化,以及土地、机械、畜力、种子、肥料、资金等

发挥作用的弹性大等特点,农业只能是个体农业。因此,不论生产规模如何,现代化程度如何,农业生产活动都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家庭经营,是农业这个产业的一条普遍规律。鸿健兄提及的重要证据是:即如美国的现代化农场,也是“家庭农场”。正是由家庭经营这一前提出发,鸿健兄进一步论述了组建农村合作社的必要性,以及自愿参加、民主管理、服务社员之类组建原则。与“后双层经营体制”的架构相关,鸿健兄还论及了另一个更深层次、也是目前颇为敏感的重要问题:必须正视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在他看来,现行的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关系,或谓占有关系,必须稳定;否则,农村将难以稳定和发展。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当然可以重组,但这个重组是市场性行为,而不应是行政性行为。鸿健兄的这些见解,对于中国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无疑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与鸿健兄相识的朋友,可以感到他不仅是一位重视行动的学者,也是一位有血性的正直之士。面对各类时弊,他常常按捺不住地发出抨击之声。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共产党员要讲“认真”》、《扫除“民盲”》等文章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些读书人写出的文章东拉西扯、隔靴搔痒,与民众相去甚远;一些为官者不闻百姓心声,不知民间疾苦,坐在办公大楼里拍脑袋作决策。”他大声疾呼:“共产党人必须回归‘认真’的传统和风气。”由鸿健兄已经出版的《现代企业经营策略》、《现代企业领导艺术》、《管理哲学》、《莱阳试验》和这部《后双层经营体制》等著作,以及他亲身投入的农村合作社事业来看,鸿健兄正是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抵御着他所指斥的脱离实际之类的学风,抗拒着“拍脑袋作决策”之类的官僚作风,坚守着他所呼吁的“认真”的传统和风气。

鸿健兄曾任《青年思想家》杂志社社长，在山东大学《青年思想家》编辑部里，在梨花城中他家的小客厅里，在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鸿健兄气势恢宏的办刊谋划、切近国情的改革方略、敢作敢为的学者风范，曾一次次为《青年思想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每每忆及，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今，风静云寂，“过日子”哲学、实利主义、犬儒主义盛行，已经窒息乃至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在如此世风之下，什么“青年”、什么“思想”、什么“激情”、什么“赤诚”、什么“正直”之类，听起来恍若隔世了。令人感动的是，两鬓落霜的鸿健兄虽不再“青年”，但仍然鼓荡着青春的热血，洋溢着改革的豪情；身为行政官员的鸿健兄，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民间立场，仍然是壮怀激烈的“行动化”的学者情怀，仍然是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学术操守，仍然是背负青天、脚踏黄土，执著行走在路上。

2010年3月16日泉城

（贺立华，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守森，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二位系原《青年思想家》杂志主编）

时间是最优秀的鉴赏家

(自序)

本书的由来要追溯到 2000 年底。

这一年，威海采用“一推双考”的方式，从全市 35 周岁以下、本科学历、任科级职务两年以上的青年干部中选拔了 39 名学员，组成了一个“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该班两年学制，其中一年时间在市委党校接受“封闭式”培训，一年时间到镇、村、企业等岗位挂职锻炼。学员经过严格的考试、考核合格后，直接提拔为副处级干部充实到各领导班子中。搞这个班次，旨在通过好中选优的方式选出一批好苗子，再加以强化培训，为党培养一批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具备“学者型领导”特征、能够应对复杂局面挑战的青年才俊。在党校教育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班次，也是把培养与使用直接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党校教育方式，因而被称为“生成式教育”，也有人称为“黄埔式教育”。

当时，我任中共威海市委党校教育长、科研处长、经济学教授，担任这个培训班的“主任组织员”，负责设计培训方案、组织教学、主持考试考核、对学员作综合鉴定和提出推荐使用意见。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对这个班次实行以专题研讨为主的教学方式，并“量身定做”式地设置了具体课

程。按照中央党校提出的“理论武装、党性修养、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的培训格局要求,共确定了8个研讨专题,这些专题都紧扣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具体实施中,先由党校教师系统讲授,让学员掌握研究这个专题所应具备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再聘请党政部门有关领导介绍实践层面的有关情况,我当时把这种教学方式称为“双讲式”。当学员对专题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层面的情况都有了系统了解和把握后,再组织学员进行社会考察,撰写专题论文,召开学员研讨会。指导教师对学员论文要逐一指导,对研讨会作出总结,并对所有论文评出分数,选出优秀论文。一年进行八个专题研讨,意味着学员要完成八篇论文,还要接受“三基本、五当代”理论与知识的系统培训,其学业负荷是很大的。八个专题中有一个是关于“三农问题”的,由我直接负责。为了保证这个专题的研讨质量,我专门为学员写了《后双层经营体制》这本讲义。后来针对我国加入WTO在即的情况,又对这批学员进行了一星期的WTO专题培训,其农业部分,便成了本书的第六章内容。这个专题研讨的有关资料连同近年来写的几篇相关文章,一并收录书后,对本书起个补充作用。

本书也是我1998年写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莱阳试验》一书的姊妹篇。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莱阳市针对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如何解决人多地少、小生产与大市场这两对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推动传统农业走向以集约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进行了不懈的、富有创意的改革试验,其试验成果引起了各级领导层、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这期间,我在莱阳市委书记慕永太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参与了“莱阳试验”的策划、推进和总

结论证,形成了许多心得。1998年底,我离开莱阳来到威海,为方便日后深入研究的需要,利用办理工作调动的间隙,我把“莱阳试验”的背景、过程、做法、启示以及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整理、汇集成一本书,取名《莱阳试验》。该书以记述为主,分析议论为辅。2001年春节刚过,接手威海市委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的教学任务后,我对“莱阳试验”的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提升,提出了“后双层经营体制”的概念,于是也就有了后来所写的讲义和现在这本书。

从《莱阳试验》到《后双层经营体制》,虽然前者以纪实性为特点,后者以理论性为特点,两者风格迥异,但表达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后双层经营体制》是以莱阳农村改革实践为实证,而对当前中国农村经营制度的架构进行的一种理论设计。依据莱阳的探索,我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

(一)必须解决两大约束矛盾,才能推动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一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它造成数以亿计达不到起码规模经济要求、因而也难以致富的“小农”;二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它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严重不对称,使农民陷入一只脚在市场门内、一只脚在门外的尴尬。这两大矛盾,一个属于生产力层面,一个属于生产关系层面。当前中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变革与设计,必须紧紧围绕破解这两大基本矛盾来展开。

(二)必须坚持一条基本思路,用劳动力换土地。比较成本理论告诉我们,区际间存在着互补关系。从农业资源禀赋看,有的地方“地多人少”。如美国,一个农户平均150公顷土地,有的地方则“人多地少”;如我国,户均只有0.5

公顷土地。这两种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比较优势。前者应生产土地密集型产品,如粮食;后者应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畜牧业、特色农业等。然后二者交换,就会形成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相互置换的效应,这就是“用劳动力换土地”。

(三)必须走好两条具体路径。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有多种具体路径可供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引进“牛文化”,也就是大力发展以奶牛养殖业为主的畜牧业,拉开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发展“傻瓜农业”,走“农户+合作社”的路子,通过合作社解决一家一户生产过程中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并完成对家庭专业化生产的整合,以规模化方式进入市场。

(四)必须建立以“三个一”为架构的农村经营新体制。这种新体制的主要内容是:走一条路子:实行农工商一体化、产业化经营,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根本上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建立一个载体: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起以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产销制度,从而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坚持一个基本体制:就是要始终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动摇,其中最关键的是不能动摇家庭经营这个基础。“三个一”之间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一个体制是基础,一条路子是方向,一个载体是手段。我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称为“前双层经营体制”,把这种以“三个一”为架构的农村经营制度称为“后双层经营体制”。

为什么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才拿出来公开出版?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出版不合时宜,二是现在出版恰逢

其时。

当莱阳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做法,在全国引起轰动,赢得了很多赞扬和肯定,但也有很多争论甚至非议。特别是对大张旗鼓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做法,许多人有不同看法。当时我任莱阳市市长助理兼供销合作社主任,就不时地感受到来自业务上级的压力。各级供销合作社都认为,办合作社是它们专有的权利,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社是抢供销社的饭碗,莱阳的做法是“毁炉挑灶”。有的人不愿对莱阳的探索进行深入考察和思考,就凭想象和思维惯性断言,搞合作社是走回头路,重搞“归大堆”、“共耕制”。也有的人担心,办合作社、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会给政府创造出政治上的压力集团。还有的人认为这是瞎折腾、出风头、不务正业。总之,那个年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争议很大,认识很不统一,因而对莱阳说三道四的人很多,给莱阳的同志形成很大的压力。一些领导即使对莱阳的探索给予了赞扬、肯定,也多是说说“官话”而已,真想把这种探索予以推广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不多。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莱阳的探索,有一种奇怪的“叫好不叫座”现象。再是,那个年头,各级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也不够高,兴奋点多集中在城市发展、招商引资等方面。显然,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出版《莱阳试验》和《后双层经营体制》,除了给理论界的研究提供点资料和参考外,在实践层面上不会产生大的效果,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我从不拒绝纯粹的理论研究,但更崇尚实践品格。曾大声地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旧中国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的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赶快走出书斋,植根生活,回答现实,为自己的学